

访谈录

◀ (上接5版)

利亚语等其他闪语的更大的框架下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希伯来语、阿拉姆语感兴趣。我想这就是现代闪语研究的开始。

继阿卡德语之后,又陆续有1929年的乌加里特语(Ugaritic),1960年代的埃卜拉语(Eblaite)等其他更新发掘的闪语文献出现。在这种情形下,一些有能力的学者开始对所有闪语进行全面研究,而不是只盯住其中一两门语言。在这轮新的学术发展中,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大学者,名叫卡尔·布罗克曼(Carl Brockelmann,1868—1956)。还有一位大师,也是德国学者,名叫忒奥道尔·楠勒台克(Theodor Nöldeke,1836—1930),比布罗克曼稍早一点。这些伟大的德国学者为闪语族比较语言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布罗克曼除了他的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法著作外,还出版了奠基性的2卷本《闪语族比较语法概论》(*Grundriss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semitischen Sprachen*),至今仍广为查阅。楠勒台克则撰写了非常全面的叙利亚语语



卡尔·布罗克曼(左)和忒奥道尔·楠勒台克(右)

法,至今是广受欢迎的参考书。这两位是近代闪语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们之后,有几位美国学者,像Cyrus H. Gordon,主要对乌加里特语做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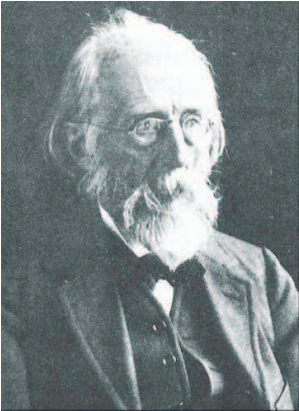
像泓玮同学所在的芝加哥大学近东语言文明系,那里有个中心(Oriental Institute,东方学院),着重研究古代近东语言。他们花了90多年时间编成一本阿卡德语字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项目启动于1920年代,最后完成的U/W卷出版于2010年)。刚开始他们觉得大概要编20年,但最终花

了90年时间编这套多卷本的阿卡德语字典。我认为闪语研究并没有什么可称作中心、重镇的学术机构,这门学问一直都是一项个人事业。这就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文汇报:作为日裔学者,您能否具体谈谈闪语研究在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开展情况。

村冈崇光:我自己是1950年代就在日本国内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了。在神学院里,多年以来就有希伯来语课程,所以在那之前日本已经有闪语研究了。我在东京读大学的时候,希伯来语是从稍微高一点的阶段开始学习的,而不是从初学者级别开始的。

我可以稍微谈一些个人经历。多年前我在缅甸一所神学院教授《圣经阿拉姆语入门》,班上大约有15名学生。我在第一节课上就对这些学生讲:“你们无需因为对西方学者有自卑情结而感到痛苦,因为据我了解,在西方的神学院里,新约希腊语可能还是必修课,但是圣经希伯来语已经通常被列为选修课了,更不用说阿拉姆语了。



村冈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展示了Burkitt奖章。英国国家学术院为纪念伟大的英国学者Francis Crawford Burkitt,从1925起,每年颁发这一奖项。

法、句法方面及圣经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为此决定授予我当年(2017)的Burkitt奖章(Burkitt Medal for Hebrew Bible Studies),并邀请我去参加颁奖仪式。我和妻子、女儿一起到伦敦接受了这枚青铜奖章。奖章上面有句拉丁语,“Meos direxit gressus fons sapientiae verbum dei”,意思是“上帝话语,智慧的源泉指引我的脚步”。英国国家学术院为纪念伟大的英国学者Francis Crawford Burkitt,从1925起,每年颁发这一奖项,奇数年授予旧约研究学者,偶数年授予新约研究学者。我还拿到了这张颁奖证书。

当我打开英国国家学术院这个奖项的网站主页时,我看到除了英国学者,还有美国、法国、德国的获奖者,但我是第一名获奖的亚洲学者。我认为这枚勋章不仅是我的个人荣誉,同时也是国际上对亚洲人在圣经研究、希伯来语研究等等方水平提升的认可。让我们再回到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闪语研究情况这个话题,我想这个事情可以当作一部分回答。

我还可以分享一件事情。1970年代我在曼彻斯特大学教书,我参加了一个日本的出版计划,旨在首次翻译出版所有与圣经相关的非“正典”书卷(Non-Canonical Books)——也被称为“外典”(Apocrypha)和“伪典”(Pseudepigrapha)。他们希望从最早的用古典埃塞俄比亚语、叙利亚语、科普特语等等写的文本开始,将之全部翻译成日语。当时还没有日本人可以翻译古典埃塞俄比亚

语文本,于是我就接下了这项任务。这套丛书在东京出版后,出版社付了版税给我。我把这事告诉我曼彻斯特大学的英国同事的时候,他说:“真是难以置信。要是我把这些文本翻成英语,我只要能找到肯出版的出版社,就已经很高兴了,根本不会去想版税的事。”英语市场可比日语市场大得多。你们要知道,基督徒只占日本人口的1%,市场很小。就靠那么点市场,那家日本出版社不但承担了成本还支付了版税,充分说明了日本对这些文本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这是另一项能说明亚洲在西方经典文本研究、近东研究方面水平上升的指标。

还有个类似的故事。多年前,我在首尔遇到一位韩国青年学者。当时他刚刚从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他研究的是苏美尔语——那不是一门闪语,而是完全不一样的公元前三千纪时近东地区的一种语言。他告诉我他归国后,在韩国的一所大学拿到了讲师职位,教授《苏美尔语入门》这门课,有30名学生选了这门课。我知道芝加哥大学也开设苏美尔语课程,但我很怀疑会有30名学生选这门入门课程。

今天下午(3月30日),李(卫峰)老师将陪我一起去北京,在北京大学作一个讲座。今年1月,北大的年轻学者林丽娟老师到荷兰拜访我,她希望我能去北大作一场叙利亚语的讲座,我答应了。几周前她在邮件里告诉我,这学期在她的《叙利亚语入门》第一堂课上,她很惊讶地发现竟然有40多名学生



来听。我听说后也倍感惊讶。我知道芝加哥大学也有叙利亚语课程。在莱顿大学,我2003年退休前,叙利亚语课程是常年开设的,但每年上这门课的学生要是超过5个,我都会很讶异了。

总体而言,我对亚洲闪语研究的未来抱有希望。今年1月,我受邀到新加坡一所神学院教授《圣经阿拉姆语入门》,邀请我的是名美国教授,他的博士论文很详细地讨论了希伯来语的不定式独立形(infinitive absolute)。你或许知道他,Scott N. Callaham。在那儿有这么一位教授,一直在那儿教书,还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诸如此类,都是我对于亚洲闪语研究的情况的观察。

文汇报:叙利亚语对于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学习者的意义何在?

村冈崇光:毫无疑问,叙利亚语或者再宽泛一点阿拉姆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原因如下。

第一,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等都属于闪语族。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都是古老的语言,仅就现代希伯来语和现代阿拉伯语而言,它们都拥有巨量的文献和上百万的母语者。但是当你处理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古代文献的时候,你就会碰到许多难点(dark corners):你可能会不知道如何解释某些词语,某些表达方式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有几种途径来处理这些难题。首先,当然是对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作透彻、精准、